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

北京文化通讯

2013年第6期
（总第13期）

本期要目

政策导览
■刘奇葆：大力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
■杨平：城镇化应直面文化命题
动态关注
■2013世界文化大会通过《杭州宣言》
■社科院发布《2013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
媒体聚焦
■“到此一游”省思录
■三十年后再问青年人生路
尖峰观点
■历史文化名城不能是“鬼城”
■我们该带什么走出去
海外视野
■汪晖对话贝淡宁：城市何以安顿我们？
■维韦克•瓦德瓦：制造业的未来在美国而非中国
研究院之声
■我院成功举办“历史理解的不同模式——中美国际学术研讨班”

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
Institute for Cultural Studies,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1. 政策导览

(1)政策文件

■ 刘奇葆：大力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

5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和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瞄准世界学术发展前沿，立足当代中国学术实际，大力推进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建设，促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

刘奇葆强调，中国社会科学院要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紧密结合时代和实践的新发展，把系统抓与抓重点结合起来，把抓继承与抓创新结合起来，做到基础研究不断加强，决策咨询类研究不要放松，努力把中国社科院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殿堂，成为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要思想库和智囊团。

刘奇葆指出，当前社科理论界的首要任务，就是深入研究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民族复兴中国梦。中国社科院作为理论研究的“国家队”，要从不同学科和学科综合的角度，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集中推出一批研究成果，为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提供有力学理支撑。

刘奇葆强调，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抓住关系全局的重大现实问题，主动贴近决策需求，加强战略性思维，开展前瞻性研究，提高服务决策的质量和水平。要积极构建让世界听得懂、能信服的理论和话语，增强中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要带头抓好学风文风作风建设，以良好的学术风气，扎实有效地开展研究工作。要把培养人才、吸引人才作为一项战略任务，造就一批创新能力和带动能力强的学术领军人物和学科带头人。

（据新华网摘编，2013年5月27日）

■ 蔡武：担当起实现中国梦的文化责任

党的十八大报告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角度，做出了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战略部署，为落实这一战略部署，全国文化系统应着力在坚持文化的科学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四个方面狠抓落实，切实担当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文化责任，全面推动文化改革发展。

具体而言，要“稳中求进”，扎实做好以下工作：一是坚持以人为本，保障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文化权益，努力改善文化民生。二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文化产业振兴，实现文化建设的可持续发展。三是把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任务落到实处。

四是创新内容，创新方式，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五是进一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

推动文化建设科学发展的着力点应放在这几处：一是牢固树立科学发展理念。坚持以长远眼光谋划发展，以全局意识统筹发展，以科学态度搞好发展。二是努力提高科学决策水平。紧密结合文化改革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努力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决策体系。三是着力破解科学发展难题。认真查找文化改革发展中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突出症结，转变思想观念，转变发展方式，创新工作方法，推动文化建设健康、有效、持续发展。

我们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融入到文化建设的全过程，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1. 对艺术创作生产的引导。通过组织重大艺术活动、开展评奖、政策扶持、文艺批评等方式，引导艺术家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作生产更多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产品。2. 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内容建设。向人民提供更多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充分利用公共文化机构的平台传播先进文化，培养共同的理想信念和追求。3. 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承体系建设。加大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力度，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增强民族凝聚力。4. 文化市场监管。严格执法，把好审批关，查处违法犯罪行为；重视对网络文化的管理；加强诚信体系建设，推动文化市场健康有序发展。5. 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引导文化企业坚持社会效益第一，努力生产出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实现文化产品的有效供给、良性供给。6. 人才队伍建设。不断完善激励机制和保障制度，培养德艺双馨的艺术人才、科技创新人才、经营管理人才，为文化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据《学习时报》摘编，记者李玉梅，2013 年 5 月 13 日）

(2)政策解读

■ 杨平：城镇化应直面文化命题

作为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城镇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新型城镇化应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然而，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究竟意味着什么？文化在其中应发挥何种作用？如何避免城镇化浪潮出现“去历史、去文化”现象？

“千城一面”是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广受诟病的一种现象，在相似的城市面孔中，看不到历史和文化对城市性格的塑造。城市有产业而无生活，有生活而无品质；传统的共同体日益瓦解，邻里生活渐趋消失，进而导致人际隔膜、阶层隔膜、人心隔膜，社会信任难以建立；青年人缺乏信仰支撑，社会缺乏共同伦理。这些现象与工业化和市场化相伴而生，成为城镇化推进过程中的副产品。关注城镇化，不仅要关注产业增长，土地制度变迁，户籍制度改革，更要关注城市文化在城市社会变迁中的重要作用，直面文化命题，因为城市文化是一个城市能否赋予人们幸福生活的重要因素。

改革开放 30 多年，中国迅速进入工业社会，但成熟的工业社会的城市形态和文化

形态却并未随之确立，种种矛盾和不适深刻反映在城市格局之中。与此同时，新工业文明正悄然袭来，信息化、全球化正成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为正如火如荼进行的新型城镇化带来更大挑战。应对工业化和全球化的双重挑战，将为我们未来的城镇化带来巨大的想象空间和更多的可能性。

如何涵养城市文化？在传统中国，政治和行政力量占主导，在当代市场经济社会，市场力量业已无处不在，而在未来，社会力量的生长将对城市文化产生日益明显的塑造作用。因此，在讨论城市文化问题时，政府的规划与行政能力十分重要，企业的创新能力和产业化能力也十分重要。此外还需要社会多元主体的自发参与，否则城市就不是一个完整的社会构造，文化就不可能多样，城市文化就缺乏生命力。一座城市的文化精神最终形成，仅靠简单的行政命令或市场的无形之手也无法实现。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社会建设，从汶川地震到芦山地震，社会力量在介入重大灾害事件进而塑造公民精神的过程中正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因此，社会多元主体的参与及其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协调，是城市文化塑造过程中的一个新命题。

所谓城市文化，说到底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它可以体现为美轮美奂的城市建筑，也可以体现为传统遗存的保护和文化产业的生长，但归根结底，它体现的应是一个城市的价值和精神。如此，城市才可宜居，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才可和谐，一代又一代的居民才可扎根，经济发展才可能藉此获得自己的文化面孔。

（据《人民日报》摘编，2013 年 5 月 6 日）

■ 姬德强：文化产业建设的三重性——核心价值、公共服务与产业经济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建设需要从三个方面得到加强。第一，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社会精神文明向前发展；第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逐渐完善，让人民群众共享文化发展的多样化成果；第三，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结构转型的重要驱动力量。从价值理想到物质现实，文化建设举足轻重。

一、文化引导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城市化步伐不断加快，同时，一些社会问题也正浮出水面，如人际关系较为淡漠、功利主义情绪有所增加等。面对这种社会状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涵盖党和国家革命与建设的历史经验、中华民族优良的道德传统，强调精神历史的传承性和稳定性。这一体系与时俱进，包含了改革开放以来党带领全国人民开拓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新局面的经验总结，是新时期统领文化建设的关键，也是社会主义文化的生命力所在。

二、文化服务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新形势下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需要注重文化服务的均等化与平衡性、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优先序列和软硬件结合等层面的建设，让文化发展“欠发达”地区和人群首先获得来自国家的文化资源支持。比如，将更多的文化发展资金投向中西部不发达地

区。当公共服务的文化资金投向不发达地区时，更要关注生活在这一空间内的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和表达欲求，而不是将一种不合时宜和不接地气的文化产品强加在他们的生活中间，从而失去发展的可持续性。这就要求文化政策和各类文化工作者尊重文化的在地性和历史感，坚守多样性的原则。

三、文化驱动力：经济结构转型与文化产业支点

始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它给世人的警示不仅是缺乏管制的金融资本可能造成毁灭性后果，而且再一次重申了“实体经济”的重要性，世界各国都在探索经济发展的未来出路。在众多探索中，“文化产业”异军突起，拥有潜在庞大的产业规模和对之前传统产业空前的整合力。

作为当今世界增长最快的经济门类，文化产业更有益于解决传统产业产能过剩和替代性危机所导致的失业、收入下降和社会不稳定等问题。社会经济的发展一方面需要依托传统产业的稳定发展，另一方面需要深刻认识到现有经济部门在不可再生能源、环境、人力资本投入和可持续性市场需求方面的局限，尽快转变发展方式，重视文化产业在重构经济结构中的重要意义。

文化产业要充分向社会个体和群体开放，维护一个起点公平和竞争公正的市场环境，并在三个方面保持多样性：参与者的多样性，尊重每一个社会个体的意愿、主动性和权利；产品的多样性，借助各种创意、制作、流通和发布平台，形成产业集群和产业链；规制体系的多样性，法律和法规要实现市场和公平原则与具体规范条文和执法的辩证统一，给足市场发展空间。

（据《中国社会科学报》摘编，2013年5月20日，本栏目摘编人：张岩）

2. 动态关注

■ 2013世界文化大会通过《杭州宣言》

5月15日至17日，“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国际会议在杭州举办，据悉，这是自1982年墨西哥世界文化政策大会和1998年斯德哥尔摩文化发展政策政府间会议后的15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次举办此类会议。本次大会正值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即将到期、国际社会对2015年后发展议程进行商议之际，探讨文化在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对于充分发掘文化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潜力以及推动把文化纳入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的议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会议闭幕式上，全体代表一致通过《杭州宣言》，号召将文化置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地位。

《杭州宣言》提出，面对人口增长、城市化、环境恶化、灾害、气候变化、日益凸显的不平等和持续贫困，我们迫切需要寻找新途径，以期从更宽泛的层面反映人类的进步，强调民族与民族、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以及平等、尊严、福祉和可持续性。这些新途径应当充分考虑文化作为一种价值体系、一种资源、一种实现真正意义上可持续发

展的框架的作用，有必要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并将文化视为本地区及全球的共同使命及创新源泉。

（据《中国文化报》摘编，2013 年 5 月 23 日）

■ 社科院发布《2013 年中国城市竞争力蓝皮书》

5 月 19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京联合发布 2013 年《城市竞争力蓝皮书》，对 287 个城市进行定量分析比较，并第 11 次发布《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蓝皮书显示，北京的知识城市竞争力排名第一，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排名第六，可持续发展竞争力排名第四，宜居、生态城市等三级指标仅居中游。

2012 年度中国知识城市竞争力前五名依次为：北京、上海、深圳、香港、南京，北京为国内创新驱动的知识城市标杆和最佳案例。北京的国际化程度高、知识存量密集、文化产业、高科技产业聚集，基础设施好，市民学习氛围浓厚。在知识城市竞争力考量的 10 个分项指标中，北京均进前 10 名。其中，大学指数、科研人数、论文发表数三项位居首位。在文化城市竞争力排名中，北京排名第三，前两名为香港和上海；在宜商城市竞争力排名中，北京仅次于香港，排名第二；但北京在宜居城市和生态城市竞争力排名上表现不佳，分别位列第 74 名和 119 名。

（据《北京日报》摘编，记者童曙泉、实习生孙宏阳，2013 年 5 月 20 日）

■ 上海交通大学发布“2013 国际文化大都市排行榜”

2013 年 5 月 28 日，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上海外语频道和上海现代城市国际化科学研究中心联合发布“2013 国际文化大都市排行榜”，调研了百座城市在文化发展方面的综合实力，样本规模空前。在总体性评价的前 20 位中，纽约、伦敦、北京和巴黎分列前四，香港和上海分列第 11 和第 14 位。

本次国际文化大都市排行榜指标设计的核心理念遵循 3D 原则，即活力(Dynamism)，多元(Diversity)和差异(Difference)，以四个综合指标来考量城市文化建设，即文化资源、文化历史、文化市场和文化多样性。

在文化资源方面，主要以一座城市拥有的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体育馆、音乐厅(剧院)及电影节文化节数量作为考量指标。伦敦、纽约、北京分列一至三位，上海位居第五。其次是文化历史，以世界文化遗产数、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建城历史时间、旅游景点数 4 个指标进行考量。意大利罗马以 14.21 的高分一枝独秀。再次是文化市场，主要以餐饮场所数、电影院数、书店数、电子游戏场数、国际旅游人数、第三产业比例等 6 个指标进行考量。洛杉矶、纽约和巴黎位列前三甲，上海和北京位列第 14 和第 15 位。最后是文化多样性，以一座城市拥有的文化社团机构数、大学数量、国际社区数以及外侨人口比例 4 个指标进行考量，纽约、伦敦和洛杉矶分列一至三位。该项前 20 强中，美国有 5 座城市、加拿大有 3 座城市入围，占排行榜的 40％。

（据上海交通大学网站摘编，2013 年 5 月 28 日）

■《中国文情报告(2012～2013)》发布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推出《中国文情报告(2012～2013)》，对2012年中国文学的发展与走向、经验与问题等进行了梳理和扫描。可以发现：

一、网络文学与数字出版亦喜亦忧

2012年数字出版势头良好：国家级数字出版基地达到9家；京东、苏宁易购、亚马逊商城推出电子书平台；数字出版规模位居新闻出版全行业第三。但由于重平台、轻内容，适合深度阅读的作品少，经典文学比重弱；过于从产业化的角度推动数字阅读与数字出版，导致了偏重功利、疏离文化的倾向。此外，2012年的网络文学用户数为19亿，较2011年年底减少4.0%，10多年来首次减少，原因在于作品质量未显著提升，创新性萎缩。

二、文学新人成长缺少引领

文学新人理应在现有的文学秩序中得到关照与扶持，但实际情形却差强人意。这主要表现为：文学批评对于文学创作的新人新作较少关照；由文学期刊、文学评奖等构成的现有文学体制，仍以传统的文学从业者为主，正在成长中的作家、体制之外的作家、网络领域的作家，虽然已进入了传统文学的视野，但仍然式微，许多地方作协在吸收青年作家方面，力度较小。

三、“后官场小说”严重变味

目前，类型小说中最为走俏的主要集中在官场与玄幻两大类别。早期官场小说由改革文学过渡而来，常常针砭时弊、揭露腐败。而后来的官场小说则渐渐进入渲染权色交易的泥淖。这种“后官场小说”使得这一题材领域严重变味。调查显示，在官场小说的读者中，党政机关公务员占30.5%，工商企业工作人员占27.1%，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占20.3%。

（据《中国青年报》摘编，记者张黎姣，2013年5月28日）

■ 故宫数字博物馆将开建 预计2015年投入使用

随着大高玄殿回归，故宫数字博物馆将启动建设。未来，故宫博物院闭馆后，数字博物馆将免费开放。

5月30日，由市科协、市文物局等单位指导主办的北京数字博物馆研讨会在首博召开，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透露了故宫数字博物馆的建设规划。据悉，紫禁城神武门外的大高玄殿已完全回归故宫，其主殿将建成故宫数字博物馆，兼具数字影院和故宫讲坛的功能，故宫现存的大量数字影像资料将在这里播放。预计2015年数字博物馆可以建成投入使用，在没有特殊文化活动的情况下，观众可以免费进入大高玄殿浏览数字故宫。

（据新华网摘编，记者王歧丰，2013年5月31日，本栏目摘编人：张岩）

3. 媒体聚焦

■ “到此一游”省思录

编者按：《西游记》第七回，孙悟空拔下毫毛变成浓墨双豪笔，在如来佛祖的手指上题字“齐天大圣到此一游”留念；古代无数文人墨客在名山大川题诗作赋，成为流传千古的人文景观；而近日刻在埃及卢克索神庙上的简体中文“丁锦昊到此一游”，经媒体发酵之后，成为非同寻常的恶性事件。“为祖国抹黑”的未成年人丁锦昊被“人肉”，连其曾就读的小学网站也被黑，一时间，“到此一游”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

其实，此种“到此一游”事件不胜枚举：伦敦奥运会期间，白岩松爬了528个台阶到达圣保罗大教堂金色回廊，看到了“国安是冠军”的涂鸦；2009年，台湾野柳地质公园岩壁上被刻下“中国常州赵根大”字样；今年2月，故宫工作人员发现太和门附近一口大铜缸被刻上“梁齐齐到此一游”，国内其他的名胜古迹几乎也都不能幸免，布满了同胞们类似的创举。

有论者称，泛滥的“到此一游”，实质是中国社会的个体存在危机的一种表现。如何证明自己是社会公认的人，证明自己的社会存在价值，是人在解决生存需求之后必然探寻的高级需求。然而由于社会的高度组织化，以及相关领域改革的滞后，社会几乎成了完全的物质社会，有形的物质展示似乎成了个体自我存在证明的唯一途径。“到此一游”，并不只是简单的炫耀心理。(郭文婧：《到此一游 不仅为炫耀?》，《北京晨报》，2013年5月27日)它显然也是一种幼稚病，但中国游客的这种偏好至今也很少见令人信服的心理学或文化学解释。(张天蔚：《“到此一游”是一种幼稚病 义愤批评未显理智》，《北京青年报》，2013年5月27日)因此，在文物上涂鸦，该检讨的除了孩子，还有我们的文明习惯和文化心理。就文明角度而言，长期以来国民道德自律和法律意识普及方面难尽如人意，就文化角度而言，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中，对此类行为的危害性缺乏普遍认识，甚至在民俗心理上，“到此一游”之类的涂鸦被视为名人墨客的“风雅之举”，这种文化习性已然成为一种文化无意识。由此在全民中普及文化遗产保护知识，形成我们的风气，不失为此次事件可以辐射的教育契机。(刘巽达：《“到此一游”，该谁检讨?》，《光明日报》，2013年5月28日)

在对“丁锦昊”们口诛笔伐之余，有人撰文称，也别太苛责丁锦昊，板子也不能都打在他身上。一朵奇葩植物的诞生，需要各种条件，这也是集体的结晶。(据谢伟峰：《“丁锦昊”并非一朵没来由的奇葩》，光明网—时评频道，2013年5月27日)我们必须反思的是：是谁让一个天真的儿童肆无忌惮地刻下自己的名字？家长首先难辞其咎；而在日常教育过程中，老师们是否抽出哪怕一点儿时间告诉孩子文明的标准，道德的规范以及公民的含义？(据石述思：《请放过在埃及神像刻字的孩子》，作者博客)

事实上，“到此一游”事件折射出的正是学校和社会道德教育的失败，德育的失败导致人们普遍缺乏公共观念，这势必给未成年人造成恶劣的影响。(据雷鹞：《“到此一游”频现 折射德育的失败》，光明网—时评频道，2013 年 5 月 26 日)因此，那些挥舞道德的大棒冲向孩子的人也应该认真地反躬自省，自己是否真的按照一个公民的标准约束自己的行为。(据石述思：《请放过在埃及神像刻字的孩子》，作者博客)明乎此，“到此一游”的风波，理应成为反思文明素养的契机。现代化的过程，同样不能缺少人的行为举止、思想意识的现代化。(据李浩燃：《激发“到此一游”的文明耻感》，《人民日报》，2013 年 5 月 27 日)

如果仅仅是笼统地从“素质”入手给予抨击，虽然让抨击者获得道德上的正义感和优越感，但对于杜绝此类事件却没有多少实际的作用。面对不良现象时，过度亢奋的道德义愤总是比较可疑的，即使从最善良的角度解读，用“到此一游”的方式表达对“到此一游”的不满，也是同样幼稚的行为。并且这种极端表达宣泄的不是正义，而是暴戾。如果舆论总是不能走出以暴制暴、以骂对骂的模式，则只能证明批评者与被批评者仍然处于同一个道德水平上。(张天蔚：《“到此一游”是一种幼稚病 义愤批评未显理智》，《北京青年报》，2013 年 5 月 27 日)“到此一游”进入公共视野，应当引起的是众人以此为镜进行对照式的反思。然而遗憾的是，一路舆情演变的结果却是一番以暴制暴的图景。打着“正义”的旗号获得了以暴制暴的快感。很明显的是，以暴制暴培育不出理性的公民。这种网络暴力的背后，恰恰是公民德行的丧失。就此而言，埃及神庙事件为我们反思我们短板提供了镜鉴，(据傅达林：《“到此一游”镜子照人正己》，《京华时报》，2013 年 5 月 27 日)

■ 三十年后再问青年人生路

编者按：30 多年前，《中国青年》杂志刊登过一篇题为《人生的路呵，为何越走越窄》的潘晓来信，这封信在当时引发了关于青年人出路的大讨论；30 多年后的今天，时代变了，但青年人对未来的焦虑依然是个沉重的话题。无论是电影《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精心营造的悲伤怀旧情绪，还是网传的具有“治愈”性质的“44 岁以下者为青年人”的世界卫生组织年龄划分标准，无论是重拾“五四”精神，还是所谓“屌丝”的自嘲无奈，在这个五月，人们集体向年轻人的现状与人生之路再发问。

似乎一夜之间，80 后一代集体变“老”了。是什么让本该朝气蓬勃的青年一代变得暮气沉沉？不可否认，那些看似矫情的抱怨背后，有着一言难尽的青春滋味。对于身处变革时代的年轻人来说，如果说“叹老”只是情绪的释放，那么精神上的“早衰”更值得警惕。那些“早衰”的年轻人，举手投足都无比正确，接人待物都恰如其分，说话谈吐都深思熟虑，但始终让人觉得缺少了年轻人的锐气与朝气，直接从少年迈入了中年。(据白龙：《莫让青春染暮气》，《人民日报》2013 年 5 月 14 日)

那么，笼罩在社会上和青年人心头的“暮气”具体指向什么呢？知名教育学家杨东平指出，当年潘晓提问时，针对的是个人价值被高度政治化的宏大话语裹挟，青年人的自我发展目标被否定的状况。而今天青年的无力感则来自于其他一些因素，如被财富权力等世俗观念绑架的“成功”定义，被忽视的人格培养、个性发展等。(据杨东平：《青年要拒绝变成“空心人”》，《人民日报》，2013 年 5 月 31 日)有人认为，比这个问题更紧迫的，是与青年未老先衰趋势并行的青年人屌丝化倾向，以及这种倾向所反映的某种社会现实与大众趣味。自称“屌丝”的人，基本属于那些被生活框定与束缚的小人物，而小人物总是过早地在生活中品味挫败感，这或许为 80 后年轻人暮气重提供了另一重解读。面对沉重的就业压力、残酷的生存竞争以及日益显现的社会不公，年轻人暮气重的状态，反映了上升渠道不畅和表达渠道收窄的现状，以及青年群体被边缘化的趋势。(据杨健：《拿什么拯救屌丝化的青春》，《东方早报》，2013 年 5 月 21 日)

比如，有文章非常具体地指出要关注底层知识青年的问题。关注“底层知识青年”即关注那些有一定文化知识和见识，但没有被纳入国家体制、没有稳定工作的年轻人。这一群体在居于弱势地位时，除了困扰自身的生存问题外，他们还会从制度乃至政治层面思考自己遭遇的不公平，进而对整个社会产生自嘲、冷漠、不满乃至对立等情绪。底层知识青年的压力除了高房价和就业难的客观原因之外，整个社会金钱至上的判断成功的标准也导致底层知识青年进一步被边缘化。由于改革的不彻底性，计划经济时代在不同阶层和地域之间设置的壁垒至今尚未消除，给底层知识青年带来“起点的不平等”，而机会的不均等始终伴随着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当他们拼命想挤入体制时，权力阶层封闭式的“代际传递”早早地向他们关上了大门。今天的中国，一副极致的阶层固化图景正在现实中形成，这无疑是一种身份时代的复归，是垄断机会、财富和资源的“集体世袭”。在这样的困境中，底层知识青年的痛感要远大于其他阶层，一方面他们背负着用知识改变整个家族命运的寄托，另一方面，整个体制却在他们通向成功的路上设置了各种障碍，摧毁着年轻人的梦想。(据凌绝岭：《不要摧毁底层知识青年的“中国梦”》，共识网，2013 年 5 月 22 日)

要改变这一现状，需要一场社会性的移风易俗，建构摒弃消费主义、物质主义的成功观，以及为公众服务、奉献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杨东平：《青年要拒绝变成“空心人”》，《人民日报》，2013 年 5 月 31 日)同时，社会也应该对他们敞开更多的机会之门，提供更公平的竞争环境，更广阔的上升空间和更有利的条件。(据白龙：《莫让青春染暮气》，《人民日报》2013 年 5 月 14 日)

二十世纪的青春想象与民族国家论述联系得非常紧密，不过八十年代的理想之光刚刚熄灭，九十年代的青春就逐渐脱离了家国话语回到个人的私人空间。青春只是个人的爱情、职业等非常实际的世俗交易。青年人不再关心政治、国家命运，也不再关心人文精神建设，而更关心个人的生存出路。(据刘剑梅：《青春话语在转变》，FT 中文网，2013 年 5 月 29 日)所以除了外界因素之外，青年人自身也应该省思。毕竟当有人把青春

的追求定位为精英时，也有人用实际行动跟所谓的“精英价值”说再见，打破“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套子，从最大众、最朴素的事情中寻求弥补，形成新的价值观念。(赵秀红：《当回忆青春，我们回忆什么》，《中国青年报》，2013－5－31 日)马丁路德金说过一句名言：“一个人如果一直没有找到值得他为之献出生命的东西，那么他就没有必要再活下去了。”这个“为之献出生命的东西”就是每个人的梦想，青年人应该反躬自问：是否找到了“值得为之献出生命的东西?”是否由之引领着自己的人生方向? 如果做到了，青年人同样能够成为与众不同的人。(据党波涛：《找到值得为之献出生命的东西》，《中国教育报》，2013 年 5 月 1 日)墨守成规、不思进取不是青春的底色，在机遇无处不在的时代，青年人应该自由去想，勇敢去闯，让奋斗成为青春的记忆。(据文言：《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人民日报》，2013 年 1 月 29 日)

（本栏目摘编人：吕鹤颖）

4. 尖峰观点

■ 穆森：历史文化名城不能是“鬼城”

今年 4 月，国家文物局局长励小捷在西安调研汉长安城遗址保护时提醒，要避免因人口搬迁面过大而成为人们口中的“空城”、“鬼城”、“死城”。这个提醒，道出了当前很多地方政府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上存在的主要误区。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核心是整体保护。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不少地方却在土地财政、旅游开发及“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指导思想下，将整体保护理解成了“打造文化”、“重建历史”、“再现辉煌”，对历史文化名城实施大规模拆迁、腾迁和改造，最终全国各地出现了一座座“空城”、“鬼城”、“死城”。要避免这些倾向，首先要正确认识历史上所走的弯路。天津近十年来的实例，或许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

1986 年，天津成为国务院公布的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2003 年，这座老城在即将迎来自己 600 岁生日之时，以“危房改造”的名义被整体拆除，只剩下几处文物保护单位供后人凭吊。老城沦为新的鼓楼商业街，周边建起了别墅区。已故的天津民俗学者张仲先生在老城的残骸上失声痛哭。近十年过去了，这个有着 600 多年历史积淀的老城厢已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空城。入夜，死城一座。这是天津无法弥合的伤口！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城没了，但文物名录中“天津卫故城遗址”还静静地躺在那里，地面上 20 余座劫后余生的历史建筑还倔强地屹立着。幸而，在新一轮的保护规划中，“老城厢历史文化街区”终于出现了。

意大利租界区曾是天津九国租界中保存比较完整的一个。也是在 2003 年，这里按“腾笼换鸟”的思路，选出有商业开发价值的历史建筑，以拆的名义腾，其余的历史建筑或被拆或重建。改造开发后，这里成为了“意大利风情区”。腾空的房屋和重建的假古董，大量空置，每座建筑前，不得不安排一位保安看管。如今这里也被列入了历史文化

街区，但摆在管理者面前最大的问题，是如何修复此前过度开发造成的破坏。

目前，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认识到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重要性，但保护方式却有待商榷。比如，开封是要在城外建一座新的汴梁城，大同基本上是把老城里的居民都迁出来住楼房，里面只搞旅游、商贸设施。这种把历史文化名城变成建一座“鬼城”的保护方法实在不可取。

（据穆森：《历史文化名城不能是“鬼城”》，《光明日报》，2013 年 5 月 13 日）

■ 张惠新：城市设计中的公众参与元素

决定城市面貌的不应只是设计师、政府领导，还应包括城市的拥有者——公众。作为城市的使用者、拥有者，公众有必要了解并参与城市设计。

在美国，城市设计的公众参与方式相当丰富，公众在每个设计阶段都有相应的参与方式。设计部门会定期吸引公众参与，广泛听取意见。对于设计部门，能够采纳公众建议，对方案做进一步调整，无疑会优化方案；对于公众，提出的建议或意见能被采纳，将会激发他们关注城市和社会的热情。

耳熟能详的迪斯尼乐园以其丰富的娱乐项目闻名于世。设计师构思精巧地营造了诸多精彩的环节，却在园区道路上产生了困惑，对自己反复推敲过的方案总是不满意，最后萌生出让游人自己创造奇迹的想法。于是，各项游乐设施建成后，各园区间全部铺上草坪，迪斯尼开放了，游人经过草地从一个区进入另一个区———于是出现了自然的、人性化的道路，迪斯尼乐园园区道路由此得以完成。这是公众参与设计的成功范例，也道出了符合使用者需求的设计才是人性化的设计这一道理。上海市普陀区的长寿公园，原来是一个社区的中心绿地，后来邀请各国艺术家创作，共同展出作品。经过一段时间后，参观群众参与评价讨论，投票决定这些雕塑作品的去留，最后成功实现雕塑公园设计师原来的构想，真正成为群众喜欢的公园。

公众参与不仅是社会公平的需要，也是现时代经济发展和提高城市对外竞争力的需要。在充分获取公众意见的基础上，由专业人员根据意见的代表性、合理性加以考虑和筛选。由此推知，相关的公共参与程序、规定也会逐步完善。

（据张惠新：《城市设计中的公众参与元素》，《文艺研究》，2013 年第 3 期）

■ 曹小晶、雷萌：论中国电影的“走出去”战略

通过各类国际电影节进军国际市场是我国电影“走出去”的主要传播路径之一。柏林电影节不仅成就了一个个国内新锐导演的国际地位，也为中国电影“走出去”战略提供了诸多可行性途径和方案。

从柏林电影节对中国大陆电影《本命年》(1990)、《十七岁的单车》(2001)、《孔雀》(2005)、《图雅的婚事》(2007)、《左右》(2008)乃至新世纪以来王全安导演的作品《团圆》(2010)的肯定，我们可以清晰地把握柏林电影节对于急剧变化的中国当下社会现实的热切关注，以及对普通小人物生存命运的人道关怀。这些获奖影片对中国形象的影像化传

播，在中国大陆的现代化进程中，恰恰是“大片化”的“古老中国、武侠中国”形象所不能替代和担当的。

参加国际电影节，在目前仍然是大陆电影与国际格局接轨、积极践行“走出去”的最主要媒介和渠道之一。虽然新世纪以来，由张艺谋开创的以《英雄》为始的华语合拍大片以其磅礴的气势又一次迈开了中国电影向世界影坛和受众进发的更大步伐，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其相对单一、老套的类型化题材模式和相对空洞的叙事在经历了国际影坛及观众对其最初的新鲜和期待之后，倘不加以审慎的变通和与时俱进，则有可能成为明日黄花。与此对应的是，近年来新锐导演的中小成本电影作品在欧洲电影节上获奖居多，它们对于当下的中国社会现实始终保持热切的关注，并且越来越呈现出相对成熟与圆融的艺术功力与温和内敛的民族文化精神内涵。尤其是《白鹿原》的获奖，这意味着：西方电影节及其观众对于“中国电影记忆中国文化气质的关注”正逐渐由影像表层的形式风格关注朝着内在历史脉络和精神观念了解和交流的深层次演变。这些新的变化，对于新世纪以来作为国家官方所极力倡导的“通过电影打造国家主流形象及提升民族文化软实力的海外传播策略”是一种极好的配合与呼应，而且在不断地趋向于内在深入化的发展。

明乎此，中国电影产业的真正成熟与良性的、可持续性的对外拓展与传播，既需要“强攻”式的商业主流大片的“高歌猛进”，也需要“细水长流”的“中小成本”电影的“浅吟低唱”，它们都分别从不同的向度和题材类型共同建构和完善着中国电影的产业化蓝图和格局，承载着对外树立和传播中国主流形象和提升民族文化软实力的媒介重任。

（据曹小晶、雷萌：《论中国电影的“走出去”战略——以柏林电影节近年中国获奖作品为例》，《现代传播》，2013 年第 4 期）

■ 我们该带什么走出去

自 2008 年建团开始，北京当代芭蕾舞团用 5 年时间以 10 部作品打开了国际市场，进入欧美主流剧院，用足尖的舞动开启了中国当代艺术和世界文化的交流，备受世界舞坛的关注，堪称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典范。

从目前的发展现状来看，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情况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宫廷的、古典的、甚至有些蛮荒性的艺术作品被推向世界艺术舞台，自认为能够受到海外观众的关注，事实却并非如此。“中国飞速发展，让世界瞩目，其实，国外观众更想了解到中国当下人的状态，中国的年轻人在想些什么，中国的当代艺术是什么样子，这是我们的许多传统甚至经典剧目无法替代的……”王媛媛说。实际上，中国文化走出去任重而道远，大多数都是政府委派，算作文化交流的项目，演出的圈子还是华人圈比较多，国际观众覆盖得不够。此外，艺术输出的方式虽很多，还仅限于“秀”，比如功夫、杂技、民族歌舞等，而且难以进入真正的剧院。很多观众认为，中国京剧只是“打”，等同于杂技，中国民族舞只是奇观的展示，表现中国人积极向上、为幸福生活拼搏的当代题材非常缺乏，尤其是对当下发展中不可避免的问题的思索也表现得不多。

北京当代芭蕾舞团用当代芭蕾输出了中国本土文化，其作品关注当下人的生存状

态，将中国的文化精神和生活现状融入当代舞蹈艺术，切实地让国外观众看到他们想看到的中国现状和中国年轻人的所思所想。他们的所有作品都是立足当代，无论是取自古典题材还是当代题材，都在进行拆解和重构，充分发挥创造力和创新性，试图寻找和当下现实生活的联系。正是因为这种现代意识的表达使舞团的表演博得了海外演出市场的青睐。

（据汤雪：《我们该带什么走出去》，《光明日报》，2013 年月 20 日）

■ 文化企业上市缘何遇“寒流”

据统计，从去年至今申请上市的 104 家广义文化类企业中，至少已经有 32 家文化创意企业已经撤回上市材料，其中不乏一些呼声颇高的“明星企业”。文化企业为什么在“临门一脚”的关键时刻撤回上市材料？这些企业又有何“不得不撤”、无奈选择的难言之隐？如此大规模的上市“寒流”对文化企业将有怎样的影响？

“此股文化企业上市寒流与经济大环境，紧密相关。”新元文智董事长刘德良如是分析说：遭遇上市“撤单潮”的并非只有文化产业，在被业界称为“史上最严”上市财务核查中，无论是终止审查数量还是密集程度都创下了历年之最。从宏观经济环境看，一季度 GDP 增长 7.7%，未达到市场预期，经济缓慢复苏。经济下行压力大，文化产业也不能“幸免”。由于文化产业弹性需求大，当企业经营困难、当市民就业压力加大时，服务于传统企业的文化产业肯定也“日子不好过”，直接影响经营业绩。

除了大环境，文化企业上市“撤单潮”，也暴露了文化企业自身的一些共性问题，比如商业模式不清晰、可持续性盈利能力差等——建银国际文化产业投资公司总经理汪泓薇认为要分析内外双重原因，多从自身找原因，文化企业应进一步完善运营管理，文化产业才能有新的发展。上市会助力文化企业的发展，但真正决定文化企业发展的却是企业是否有成功的商业模式，能否有较强的复制扩张能力和运营管理水平，这是文化企业发展的核心。此外，一部分文化企业上市“撤单”的原因在于，其本身并不具备上市要求，但却采用“化妆”和“催熟”的方法，美化和制造业绩。这种不严谨和不规范的做法在走向完善的资本市场中必将得到约束。

“撤回上市材料并不意味着对文化企业的否定，但要求文化企业要有所转变，要有新的融资方法，以适应新的环境变化。”中国传媒大学文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齐勇峰对文化企业的发展方向提出建议：从文化企业的特点来看，其销售的内容多为创意类产品，所以文化产业不仅仅要靠资产去推动，而应靠创意和资源去推动，文化企业急需增强主营业务的自我循环盈利能力。“撤回上市材料，并不表明文化产业投资没机会了，反倒要求投资人对文化产业投资要更加谨慎，投资要更加专业化”，汪泓薇认为，上市未必是投资文化产业的主要方式，投资文化创意企业的机构需要更多通过整合并购实现投资效益。

（据张玉玲：《文化企业上市缘何遇寒流》，《光明日报》，2013 年 5 月 30 日）

■ 黄力之：论“好莱坞”文化对主流价值文化构建的借鉴意义

在构建主流价值文化方面，中国与美国的做法显然有别。中国强调的是国家机器对主流价值文化生产的引导权，美国则是一个非文化控制的国家，国家机器体系中无文化机能。但美国并非没有主流价值文化，以“好莱坞”电影文化为范本，便可大量而深刻地窥见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文化。

好莱坞电影是集艺术、意识形态宣传、娱乐为一体的，三者最大的共通之处在于接收者数量众多，即大众化。在文化史上，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区别是非常明显的，在精英文化成为主流文化的过程中，大众文化的缺失不只是一个文化事实，同时也是大众成为被压迫者的标志。在文化普及、互联网涵盖大多数人群的今天，艺术如果想要避免自行没落的命运，便只能选择大众化这一路径。

好莱坞电影对艺术、意识形态宣传和娱乐的大众化问题的解决，是有一个过程的：20 世纪 50 年代，由欧洲移民构成的文化精英抵抗娱乐以捍卫文化，维护两种文化间的界线。在 60 年代的后现代主义运动中，美国还出现过先锋派电影运动，这是文化精英的实验性工作，与好莱坞的风格、路径迥异。然而，先锋派电影的观众人数始终是最少的，其遭遇就证明了大众化选择对艺术的生存意义是不可否认的。

如果没有价值观的认同，特定的电影或者其他艺术便无法在不同的国家、民族中被接受。好莱坞电影一方面体现了美国的价值观，但同时也体现了人类的文明共识，也正是这一方面使之能够向全球扩展。大体来说，人类的文明共识在好莱坞电影中主要见之于善恶冲突、爱情、人的奋斗精神等方面。如果舍弃这些人类文明共识，我们就无法理解好莱坞电影在当今世界文化中的地位，毕竟技术因素并不能决定一切。

（据黄力之：《论“好莱坞”文化对主流价值文化构建的借鉴意义》，《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3 年第 1 期）

■ 周永坤：网络实名制立法评析

网络的“弥散性”特点为民意的形成提供了极佳的技术手段，因此它是大型民主社会得以可能、并臻于完善的技术条件。网络自然也有其弊端，因而需要管理；但过分的管理又可能伤及网络自由。针对利用网络进行的违法行为，一个自然的社会反应便是网络实名制。美国早就有网络实名制的呼声，但没能推行开，他们担心网络实名制会对言论自由构成威胁。世界上实行网络实名制的只有韩国，而韩国的经验已经证明，网络实名制是对“网络暴力”的过度反应，是情绪化的、草率的错误选择。

中国实行网络实名制的立法理由大致可以归纳为网络安全、发展经济等。时下中国网络安全确实有许多问题，例如网络诈骗、诽谤、制造假新闻等等，然而是不是维护网络安全就一定要实行实名制呢？答案是否定的。将网络安全与网络实名制立法直接关联的思维其实是建立在两个误解之上的：一是网络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两分，二是在此基础上认为现实世界的法律不适用于网络世界。网络实名制立法是一种“赖政”式思维，将网络安全归咎于匿名制，而没有检讨执法者自身的“不作为”。

因此，我们有理由追问：是什么促成了网络实名制这种非理性立法？首先当然是缺乏保护言论表达自由的宪政理念；其次是社会管理观念上重立法轻执法的问题；再次是管理至上的立法观念问题，在家长主义立法观下，网民的利益被忽略；最后是在意识形态的反普适性价值观念影响下形成的所谓“特色立法观”。当然，中国的网络乱象是严重存在的，对此，除了严格实施宪法与法律外，还需要三个前提性的制度设计，即：色情与暴力信息的分级制度；利用网络侦查犯罪的行为的法院监控制度；公民对监控行为正当性的诉权制度。

（据周永坤：《网络实名制立法评析》，《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2 期，本栏目摘编人：吕鹤颖）

5. 机构动态

■ 香港浸会大学举办“比较的视角：社会化媒体，监管和表达自由”工作坊

5 月 23 日至 24 日，“比较的视角：社会化媒体，监管和表达自由”工作坊在香港浸会大学举行，本次工作坊由浸会大学新闻系与清华大学新闻学研究中心共同举办，并得到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的支持。

社会化媒体具有趋同性、参与性、开放性及跨国界的性质，社会化媒体的成长不仅挑战了建立在传统媒介形式和民族国家语境基础上的媒体政策及监管的实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新的刑事和民事法律问题。“比较的视角：社会化媒体，监管和表达自由”工作坊以社会化媒体的政策和监管为主题，邀请了来自英国、美国、越南、中国大陆以及香港本地的学者和媒体从业人员，就平衡表达自由和社会媒体监管、社会媒体的接入和服务的提供、社会媒体的内容、毁谤・隐私和数据保护、信息经济学对社会媒体的影响和转型社会中社会媒体规则等议题展开了讨论。

（据香港浸会大学网站翻译整理）

■ 南京大学主办第三届世界人文科学国际研讨会

5 月 18 日至 19 日，第三届世界人文科学国际研讨会“人文研究的价值：跨文化与跨学科的对话”国际学术会议在南京大学举行。本次会议由南京大学高研院和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人文与全球文化研究中心共同主办。来自国内外知名院校的 30 余位专家共聚一堂，就“人文科学”、“跨文化对话”、“人文教育”、“全球化危机”等话题展开讨论。

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与会学者围绕“人文研究的价值”、“哲学与经典”、“性别与表演研究”、“比较文学研究”、“文学与古典研究”、“建筑与政治”、“历史与人文”等议题各抒己见，在交流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对于人文学科发展面临的困境，南京大学周宪教授提出必须重新发明具有行动特性的人文学科，才能使人文学科在新的形势下成为有效的教育内容、方法和领域；Michael Levenson 教授提出了人文学科与日常生活相互

交叉与接触的观点；牛津大学的 Helen Small 教授探讨了人文科学对幸福的贡献；清华大学的王宁教授描述了全球化时代中国的知识状况以及人文教育的必要性。

（据南京大学网站摘编，2013 年 5 月 21 日）

6. 海外视野

■ 汪晖对话贝淡宁：城市何以安顿我们?

2013 年 5 月，凤凰网与单向街书店共同举办“城市的精神——全球化时代城市该如何安顿我们”主题沙龙，邀请清华大学贝淡宁教授和汪晖教授就贝淡宁新作《城市的精神》展开对话。

贝淡宁认为 21 世纪是淡化国家身份强化城市身份的时期，爱国主义是导致国际关系敌对化的重要原因，而爱城不仅会消减不同国家民族间的敌意，而且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合作和改善民生方面有积极的作用。独特的城市精神是制造市民归属感的最重要因素，而这种归属感与包容开放又必须得到协调。爱国必须受制于国族界限，但爱城市却可以跨越地域、民族的区隔。政府在解决民生发展经济的同时，一定要兼顾城市精神的培植。城市归属感的缺失，与为了追求现代化而破坏历史资源有很大关系，在这方面，当代中国城市建筑的同质化是负面典型。

对于独特的城市精神，汪晖认为近 20 年来的城市化忽视了地方文化与城市建设之间的关系，速度和规模成为城市化进程的最突出的指标，而实际上，即便是在北京这样外来人口众多的国际都市，也依然存在着大量民众得不到认同、缺乏尊严的情况。城市规模快速扩张给外来务工人员的社群组成带来了巨大变化，面对激烈的生存竞争，他们不得不依靠家乡的纽带在城市里重构自身的社群，这种极具文化内涵的现象提醒我们，应该关注哪些文化精神能够激发人们的认同感。汪晖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权限的日渐增强带来了“政治公司化”的现象，以盈利为目的的城市规划最终必然指向经济性城市的建设，政府行为服务于资本增值和扩张，比如很多著名旅游景区的保护性开发，在拉动经济的同时却也带来了地方文化的破坏。

汪晖进而提出了城市—乡村文化权力不均衡的命题。过快的城市化带来了城市—乡村的对立关系，改革开放前期还曾留存的带有乡土色彩的温情善意都被迅速清除，城市的巨大优越感使得乡村必然要依附于它，乡土文化也就不再能够成为解决城市化进程中的伦理困境的资源，但城市本身也提供不了纾解难题的文化精神。所以，必须清醒地认识城市之于乡村在政治、文化方面巨大的权力优势，才能有助于解决城乡之间的矛盾关系。贝淡宁也关注到了城市和乡村的矛盾，他认为香港在经济腾飞过程中对儒家伦理价值的保持，有效地缓解了二者之间的这一矛盾。在贝氏看来，香港和新加坡的城市发展与价值观建构都有其独特的气质精神，加之主体民族都是华人，所以他们的模式之于中

国城市很有借鉴意义，特别是新加坡的贤能政治、香港的儒家特色资本主义，都很好地对接了中国的文化传统。

汪晖认为香港的特色体现了习俗和文化的有效保留，但这实际上是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人对城市的选择和认同实际上与个人命运息息相关。城市精神的可贵之处还是在于其对单一认同的超越，而这正是中国文化的优势所在，所以我们今天就应该特别关注新的城市文化的生成。贝淡宁最后描述道："如果天堂只有一种城市，一种时代，我觉得那不是天堂。天堂需要不同的城市，不同的时代，需要30年代的哈尔滨精神，需要70年代的柏林精神，80年代的耶路撒冷精神，这样才是天堂。"

（据凤凰网读书会摘编，2013年5月6日）

■ 郑永年：城市的政治化与城市体制改革

城市化是未来中国发展的必由之路，在这一过程中，城市化的推进者必须考虑以人为本和全球化两大因素。不把以人为本作为目标的城市化，其结果从基础设施的漏洞百出就可见一斑。现存城市管理体制侧重于"上级管理下级"，就是"上级官员管理下级官员"，而不强调如何管理城市人。管理官员的官员太多，而管理城市人的官员太少。前者造成官僚体制内部的巨大摩擦，后者造成官僚体制和城市居民的对立。全球化表明包括人、财、物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城市管理体制的改革也不能忽视此一潮流。提升城市的国际竞争力几乎是所有国家的国际竞争战略，各个主要城市当局也有巨大的动力来提升自己的城市，较之主权国家，城市的自我改革更具优势，特别是在文化方面。

城市文化的主要功能是塑造认同，城市认同是最重要的软力量和裁量城市化成功与否的标准。在吸引人才方面，城市的认同非常重要。全球化不仅没有减低国家认同，反而在增加和强化国家认同。因为城市认同往往强调的是文化、宜居等方面，城市认同的强化也有利于国家认同的增强，并且这种认同往往比民族主义式的政治认同更具有生命力。

城市升级同时也是附加值增长的过程。我们不能拆掉一个旧城市来重建一个全新的城市。城市的一砖一瓦都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城市文明不仅仅是物理意义上的城市建筑物，更是文化意义上的城市建筑物。政府官僚主导下的中国城市化经常出现两个大问题。第一，很多官员把城市化或者城市升级理解成为现代化，他们往往对城市进行"破旧立新"式的改造和重建。第二，很多官员把城市化或者城市升级理解成为西方化，因此，在中国传统消失的同时，西方特色则越来越明显了。一些官员自以为造出了一个很现代化的城市，但问题在于，如果人们对城市没有认同感，那就没有附加值。如果一味追求城市的简单扩大，城市发展不仅很难持续下去，到了一个阶段，还会走向衰落。

在产业升级上，从国际经验来看，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到知识密集型再

到服务密集型是产业转型和升级的必由之路。到现在为止，发达城市的经济和产业升级已经走过了这些阶段。中国的城市不能简单重复这个路径，但这个过程的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方向。

城市政治体制改革在中国是更为紧迫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在很多地方，以钱为本和以官僚为本成了中国城市化过程的主导原则，导致了城市化过程中的权钱一体化。权钱一体化的确造成巨大的动力，快速有效地推进了中国的城市化。但是，这种一体化也导致了各种严重的问题。在过去的 30 多年间，中国取得了高速的经济增长。高速经济增长主要有两个来源，即内部的体制改革和外部的与国际经济的整合。但从近年来的情况看，这两方面的动力都在消退。所以下一步的城市化必须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统筹城乡，提升公共服务，保护农村，如改善乡村教育和医疗水平；简化城市行政机构的层级，增加直辖市、取消市管县等。

（据郑永年：《城市的政治化与城市体制改革》，《文化纵横》2013 年第 2 期。作者系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东亚研究所所长。）

■ 维韦克·瓦德瓦：制造业的未来在美国而非中国

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发表题为《制造业的未来在美国而非中国》的文章，作者为杜克大学企业家精神与商业化研究中心主任、斯坦福大学罗克公司治理中心研究员维韦克·瓦德瓦。文章称，更多趋势说明，现在的风向变了，开始轮到中国担心了，很多公司老板都有意把制造业搬回美国。将来加速这一趋势的，不是人们认为的中国劳动力成本增加或人民币升值，而是技术。不久后，技术进步将使中国的制造业像过去 20 年里美国制造业那样迅速衰落。

首先是机器人技术。中国目前正在从事的工厂组装业务与下一代机器人相比简直就是小儿科，这些机器人很快就会成为更廉价的劳动力。中国最大的制造商之一台湾富士康公司去年 8 月宣布，该公司计划在 3 年内安装 100 万台机器人，代替工人目前正从事的工作。该公司发现，即使廉价的中国劳动力也要消耗巨大的成本，并且这样的劳动力十分紧俏。

其次是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技术将在制造业中寻找到一席之地，并把制造业变得“个性化”。未来将出现一种“创造者经济”，届时，大规模生产将被个性化生产取代，人们将依照从互联网上下载的设计或根据自己的设计定制产品。在传统的制造业中，零部件是由人类利用能量驱动的机器工具制造出来的，即通过物理方式去除不必要的材料，直至得到你想要的形状。这是一个十分麻烦的过程，随着复杂程度的增加，这个过程会变得更加费时费力。而在叠加制造中，零部件是根据三维模型，通过逐层融合制造出来的，这是一个不断添加材料而不是减少材料的过程。它可以不使用任何工具或固定设备制造出目标产品。这个过程不会产生任何废料，成本也不会随着复杂程度而增加。

在下一个十年中，另外一些技术进步也很有可能影响制造业，尤其是纳米技术。工程师和科学家们如今正在开发新型材料，这些新材料将可以生产出比现有制造业产品更

加坚固、轻便、节能和耐用的产品。所有这些进步都将大大提高美国的创新、摒弃旧工业和不断重塑自我的能力。中国人还在忙于复制美国在过去几十年里创造的技术，他们尚未清楚该如何创新。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机器人、人工智能和 3D 打印技术将迅速发展和聚合。美国企业现在已经发现，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运输成本和时间滞后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是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几大障碍。作为当前最先进的汽车，特斯拉 Roadster 跑车在美国的制造已经开始使用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谷歌公司刚刚宣布，该公司广受好评的 Nexus 7 平板电脑将在美国生产。这还仅仅是个开始。

（据维韦克·瓦德瓦：《制造业的未来在美国而非中国》，《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13 年第 4 期，本栏目摘编人：李大恒）

7. 研究院之声

■ 我院成功举办“历史理解的不同模式——中美国际学术研讨班”

5 月 14 日至 30 日，由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美国克莱姆森大学比较文化中心联合主办的第一期“中美国际学术研讨班”成功举办。本期研讨班的主题是“历史理解的不同模式”，共包括 9 场高水平的学术论坛，3 场美国知名教授演讲以及 3 次美国教授主持的电影课堂教学。

国际学术研讨班是文化研究院在国际学术和文化交流方面探索的一种新模式，是一个全方位、高水平、可持续的合作平台。所谓“全方位”是指，其学术活动覆盖教授、研究生和本科生等不同层次，既有研究内容又有教学内容，在举办高水平学术研讨(围绕几位教授精心准备的论文展开，吸收研究生参与)的同时，还请美国学者开设面向研究生和本科生层次的讲座和探究性课堂教学。所谓“可持续”是指，研讨班是一个持续运行的学术合作平台，计划每两年举办一次，由中方(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与美方(美国克莱姆森大学)轮流承办，每期更换研讨主题，研讨班的最终成果将以论文集的形式在中美两国用中、英两种文字出版。

5 月 30 日，本期研讨班圆满闭幕，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邱运华教授、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陶东风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张晓明教授、美国克莱姆森大学外文系主任安延明教授等参加了总结座谈会。中美学者就首届研讨班取得的成绩和经验进行了总结，并达成了长期合作的意向。双方认为，在未来的合作中，应该进一步增强中美学者的学术交流，争取高质量学术论文的出版，同时，各方将共同促进品牌化学术活动的建设。

主　　办：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
主　　编：陶东风　邱运华
执行编辑：符　鹏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83 号，100089
电子信箱：wenhuazhanlue@ gmail. com
联系电话：(010)68903449、68903576

(内部参考)